

试论徐阶之“三语政纲”

赵世明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天水 741001)

摘要: 徐阶成功扳倒严嵩后, 推行“三语政纲”, 以期扭转嘉靖后期的怠政、朝政混乱、言路大坏等政治弊病。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以及措施的失当等原因, 收效甚微, 甚至某些举措非但于事无补, 反而使问题愈加严重。因此, “三语政纲”并没能真正挽救嘉靖末年的社会政治危机。

关键词: 徐阶; “三语政纲”; 皇权; 言路

中图分类号: K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3-0101-05

一、“三语政纲”的提出

徐阶(1503-1583), 字子升, 松江华亭人, 嘉靖二年(1523)进士。其人“性聪敏, 有权略, 而阴重不泄”^{[1]5631}。嘉靖议礼时与张孚敬等有异议而一度被贬。严嵩专权时, 对世宗只顾修炼、不理朝政进行过一定的规劝。后因青词称意而渐受重用, “乃谨事嵩, 而益精治齐词迎帝”^{[1]5633}, 接着“附籍江右, 又与世蕃结亲”^{[2]36}, 从而在宦海中站稳脚跟。其时, 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使嘉靖后期局面下滑, 各种问题逐渐显露, 亟待整治。最后, 在严嵩专权逐渐败露、朝臣连章弹劾的情况下, 徐阶于嘉靖四十一年, 联络方士蓝道行、邹应龙驱走严嵩, 出任首辅。

可以说, 徐阶目睹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 对这一时期的各种弊病均有所了解。出任首辅后, 也开始了对朝政的匡扶, 其核心是实施所谓“三语政纲”的政治纲领, 即“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还公论”, 并将“三语政纲”书于直庐墙壁, 用以提醒自己。“三语政纲”是针对严嵩专权和世宗怠政而提出的, 主要目的是改变严嵩专权和世宗怠政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和言路败坏等问题。

二、“三语政纲”批判

三语政纲从表面上看, 似乎很有针对性和建设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现实中却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甚至走向反面。

第一, “以威福还主上”和世宗继续怠政。

严嵩十几年的专权导致皇权下移, 这一点为众大臣所担忧。尤其是世宗对权力敏感至极, 因此, “嵩握权久, 遍引私人居要地, 帝亦寝厌之”^{[1]7918}。世宗是不会容许大臣挟权的, 他“威柄在御”^[3]是出于权力的考虑, 后期对大臣的猜疑同样出于权力的原因。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十大罪

收稿日期: 2007-12-06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08)

作者简介: 赵世明(1975-), 男, 甘肃清水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明清史

之二正是瞅准了这一点：“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穷君上之大权。”^{[1]5538} 严嵩专权不但冲击着皇权，也侵蚀着朱氏江山。蓝道行以卜语“道严嵩父子弄权状”，于是，“上心动，欲逐嵩”^[4]，其根本原因已经非常明晰。

徐阶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而提出“以威福还主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同时，这条政治主张有徐阶自己的理论基础，即《世经堂集》^{[5]376}所言：

传曰：人君以论相为职。夫百官孰非人君所当论？然独云以论相为职者，良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论，然后足以彰恩自上出，而命自上制也。今阁臣虽不敢谓之相，然实有辅政之责，与庶官不同。祖宗时多出朝廷自择，盖有见于此。

规劝世宗掌握人事大权，特别是亲简阁员，是徐阶实施这一主张的主要表现。正因为内阁制度已经完备，内阁位高权重已是事实，对内阁人事权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对朝政必将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徐阶要求增添阁员并请世宗“亲简”，世宗答曰：“汝以不知为对，但君知臣惟尧舜耳，太祖为圣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简至于如此，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廷推非道，相必君择，古正理，后世宫生之主不知人焉。”^{[5]376} 世宗的漠然显而易见。其次，徐阶还要求与阁员共同票拟，即“阁员公同票拟”：“臣（袁）炜兹出，例该辰时入阁，申请出阁，伏乞圣明容臣于每日未时之末，会炜由阁到直，将各章疏公同票拟毕乃还家。庶臣愚获少道咎戾，而炜于皇上出入之命亦无所违，臣无任祈请之至。”^{[5]376} 对此，世宗并不完全赞同，也很不以为然。在徐阶的再三坚持下，世宗才勉强同意。单就这两事而言，世宗并没有做到“人君自论”。这当然不能安全归咎于徐阶，但是，从深层来看，对已经昏溃不堪的世宗提出这种要求未免存在形式主义错误。如果说徐阶实现了世宗亲简阁员和“阁员公同票拟”，那么，这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对政治革新意义甚微。这是因为：一，世宗于徐阶任首辅时亲简入阁的严讷（嘉靖四十四年）、李春芳（嘉靖四十四年）、郭朴（嘉靖四十五年）和袁炜均被称为“青词宰相”^{[6]59}，也就是说，世宗亲简阁员仍然与追求长生紧密联系；二，阁员共票必须建立在阁员政见相同和互相团结的基础之上。但事实是，袁炜、郭朴、高拱等入阁后矛盾重重。袁炜与徐阶共票三年，有形式而无实际内容。史载：“（袁炜）故出徐阶门，直以气凌之。与阶同总裁《承天府志》，诸学士呈稿，炜窜改殆尽，不以让徐阶。诸学士不平，阶第曰任之而已。”^{[1]5118} 这绝非真正意义的共票。然而，徐阶一直努力地维持哪怕是形式上的共票。所以，袁炜病归，严讷、李春芳等开始了新一轮共票，但“春芳、讷事之谨，至不敢讲均礼”^{[1]5642-5643}。这时，与其说是阁员共票，不如说是次辅唯唯诺诺地、不情愿地迎合徐阶，所以也不能完全称之为共票。等到高拱入阁后，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再度激化了。

当然，徐阶希望以“以威福还主上”为契机，要世宗总大权，理朝政，改变每况愈下的局面，但世宗依然我行我素，照求长生，不理政事。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世宗“谕辅臣徐阶等，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四十一年八月，世宗言：“自访取龙涎香以来，二十余年，所未及数斤，辄以去冬毁于火，传谕尚书高耀设法取用。”四十一年十一月，诏求方书，“上晚年求方术益急，进法书六十六册，诏留览，赐显冠带银币。乃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篆秘书。阅二年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四十五年，海瑞冒死独谏之因是“见上久不视朝，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廷臣表贺，无敢言者”^{[4]1744-1790}。

如果将“威福”单纯地理解为权力，那么，世宗从一开始就非常强硬且权柄自操，即便严嵩对皇权的威胁仍然存在，但也很微弱。但笔者以为，“威福”还包含皇帝的职责这一层含义，除了健康原因外，世宗对政事已经相当厌倦，却对斋醮、神仙非常热衷和迷信。那么，他的帝王职责却在后期远远没有履行，或者没有真正履行。所以，徐阶不能改变世宗，也就不可能实现“以威福还主上”。

第二，“以政务还诸司”与内阁的位高权重。

“以政务还诸司”主要内涵是要重视各部院，而非只重礼部；削弱内阁权力，提高各部院职能。严嵩用事，“政事一归嵩”^{[1]7915}，严嵩几乎代表着朝廷，“严分宜在事，凡柄国十九年，以吏、兵二曹为外府，稍不当意，或诛或斥，二曹事之如援吏之对官长，主奉行文书而已”^{[6]245}，因而徐阶此举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严嵩。

但是，如果看一看内阁制度的发展，或许我们就能发现“以政务还诸司”存在的问题。朱元璋废丞相设殿阁大学士，一种有别于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开始萌芽。永乐时期，内阁之名出现，阁员也开始参与机务。英宗九岁登基，三杨辅政，“三杨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御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7]，这就是票拟制度。内阁票拟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日常化的职能机构的出现，最初的顾问性质也发生重大变化，“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1]4120}，“机密所系”、“旦夕侍朕”使内阁发展具有了很大的弹性，也就是说它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有汉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国初顾问之荣而兼隆位号，地亲势峻，言听志行，柄用专且重者莫如今日”^{[1]6640}。所以至正嘉时期，内阁权力已经完全在六部之上，内阁首辅“无宰相名，而有丞相权”^{[1]5538}。这一时期，司礼监权力也在膨胀，批红权的出现使内阁权力受到很大制约，“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1]1730}。这样，臣工章奏先送内阁拟票，然后司礼监批红，最后皇帝决断的政治运行模式完全形成。另外，阁权提高的同时，内阁内部也发生了权力分配变动。最初阁员之间并无尊卑，仁宣以后，“诸辅之中尤以首辅为重”^{[1]3305}。从总体趋势来看，内阁权力在一步步加强，同时内阁首辅权力核心地位也日渐形成。然而，首辅权力过分膨胀，形成首辅专权、压制百司的局面不是内阁权力的正常化表现。比如，张璁出任首辅，颐使百僚；夏言任首辅，“凡所拟旨，行意而已，不复顾嵩。嵩一唯唯”；严嵩任首辅，“俨然以丞相自居。挟一人之权，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题覆，先面禀而后敢启稿”^[8]。这些情况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而且也不能看作是内阁的制度化的结果，并有其负面影响。特别是严嵩专权、权压百司是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容忍的，而世宗的怠政是其主要罪魁之一。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内阁应有的权力，并借以否定已趋于成熟的内阁制度。内阁和内阁首辅的决策地位和权力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之所以高拱、张居正能完成一系列重大改革，是内阁权力核心的形成和首辅掌握内阁大权避免了政事的相互推诿，并提高了行政效率的结果。也就是说，权力核心的形成造就了内阁制度的成熟，进而便利了改革的推行。那么，徐阶弱化内阁权力借以提高各部院的权力的做法显得有违历史潮流，也与嘉靖前期强化内阁行政职能相悖离。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行通，一方面，世宗没有改变只接见首辅的习惯；另一方面，中央决策的运行机制成就了内阁的权力核心地位。所以，徐阶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就是：增添阁员，维持阁员共票，形式上弱化首辅权力；人事变动，即任用一些大臣，如杨博、严讷、高耀、黄光升、雷礼等，依靠人本身的能动性借以发挥部院职能。这些都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改变决策机制，才能从实际上

改变阁权之重和首辅之尊。随之问题却会产生：没有权力核心，行政效率也将大大降低，增加了阁员火拼的可能，隆庆朝阁员之间的火拼相当严重与此有关；如果皇帝荒政，中央要么争权夺利，要么一盘散沙，导致权力真空。所以，内阁位高权重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尤其在明中后期更是如此。事实上徐阶没能扭转局面，也不可能扭转，而部院也只是充当着执行机构的角色。

第三，“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与言路的继续下滑。

明初建立了相对独立而系统性的监察机构，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即所谓科道，也就是言路。科道官虽品位较低，但掌握纠察大权，权势较重。明初言路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抹杀，但自仁宣以后便开始下滑，嘉靖前期对言路的整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张璁言：“祖宗言官之设，为天子耳目，迄今率甘为权臣鹰犬，甚可耻也。”^{[9]996}言路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对权臣的依附而缺少独立性，即如田澍先生所言：“促使世宗下决心整肃言官的直接原因是大礼议中大多数言官依附杨廷和而与世宗的对抗。”^[10]高拱也批评言路是“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而已”^[11]。严嵩专权时期，严嵩一方面极力压制言路，一方面又笼络一些奸人为其摇旗呐喊，排除异己，导致言路每况愈下。沈炼指责严嵩“阴制谏官，不敢直言”^{[1]5534}。张璁言严嵩“箝天下口使不敢言”^{[1]5566}。徐阶也明确指出了言路存在的问题：“但（科道官）性气粗率，则言或过当，事出风闻，则语或失实。其不谙事体，渎扰宸严，诚有如圣谕者。”^{[5]376}同时他还规劝世宗“惟广听纳”，希望世宗对言路有“天宽地容”之圣德。

无疑地，徐阶倡行“以用舍刑赏还公论”是及时的，严嵩钳制言路的状况也需改变。在言路蜕变得已经面目全非的时候，徐阶一反严嵩压制言路的做法，请求世宗宽舒言路。在徐阶的努力下也有不小收效：“自是于白简所封进，即小忤不深治，而言路恃公（徐阶）强益发舒矣。”^[12]我们承认，徐阶宽舒言路在清洗嵩党、顺利平反严嵩制造的冤狱和驱逐方士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自己地位的巩固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徐阶似乎对言路的问题并不十分明晰，反而在为言路进行辩护。言路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脾性或“不谙事体”那么简单。严嵩钳制言路对言路造成的负面影响诚亦有之，也必须改变。但一如高拱所言，言官往往早已甘当鹰犬。史载：“言官职居言路，往往未闻利民实语，不过徇私适己，嫉人自伐。”^{[9]2816}这才是言路问题的关键，也是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然而，徐阶的做法仍局限于严嵩对言路压制态势下言官不敢直言问题的纠正，把重点放在宽舒言路，而没有涉及到言路问题的实质。而且，徐阶也没有考虑整个吏治的刷新，因为言路的完全改变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吏治，否则将是一句空话。因此，徐阶单纯地就言路而言路的做法不可能解决言路存在的根本问题，况且也没能抓住关键问题。在没有良好的吏治环境下而一味宽舒言路，其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积极意义。其一，吏治不清，言官也难正，不能排除言官成为新权臣的鹰犬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徐阶借此在隆庆元年很快击败了高拱、郭朴等人。高拱复出后不得不以特察科道来整顿言官借以整饬言路，当然还包括对整个吏治的革新，因而效果非常明显。因为隆庆后期和万历前期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当年徐阶驱赶高拱时“举朝攻拱”的类似局面。其二，在言路彻底下滑的大背景下，言路宜导不宜舒，宜严不宜纵，纵则险于失控。隆庆元年“举朝攻拱”的局面也令“识者非之”，这是徐阶舒发言路的后果。而且，事实上，言路早已失控，“徐阶欲以开放言路借外廷公论导向朝中政治，而当徐阶真的将朝政驶入这一轨道时，公论本身却已经出了极大问题”^[13]。因此，“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仅仅涉及问题的皮毛而已，并没有触及言路败坏的实质问题。

三、结 论

总之，“三语政纲”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因为它针对嘉靖后期的弊政提出，并对此有所匡正。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状况的制约：世宗对政事的需求远远不及斋醮；内阁权重和首辅独尊是内阁制度发展的需要，也是明朝历史发展的需要；言路早已成为“博噬善类”的工具，宽舒有笼络之嫌，宽远不如严，舒发远不如全面整顿；而且，徐阶其人“事先帝无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误，畏威保位，诚亦有之”^{[1]5931}，因此，“三语政纲”不可能也没能真正挽救嘉靖末年的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于慎行. 谷山笔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夏燮. 明通鉴: 卷 6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789.
- [4] 谈迁. 国榷: 卷 6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3977.
- [5] 徐阶. 世经堂集[C] // 季羨林, 任继愈, 刘俊文.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6]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焦竑. 玉堂丛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01-202.
- [8]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25.
- [9] 徐阶. 明世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0] 田澍. 嘉靖革新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77.
- [11] 高拱. 高文襄公集[C] // 季羨林, 任继愈, 刘俊文.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08-384.
- [12] 王世贞. 弇州山人续稿[C] // 王直. 明人文集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6290.
- [13] 姜德成. 徐阶与嘉隆政治[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302.

On Xu Jie's Tri-lingual Platforms

ZHAO Shim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China 741001)

Abstract: After he succeeded in ousting Yan Song, Xu Jie carries out Tri-lingual Platforms policy to reverse the political evils in the late Jiajing period, such as the indolent ruling, the ruling confusion and the malicious criticisms. However, the policy doesn't take much effect because of its inherent limitations and improper measures. What's worse, some of his policies bring about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s. Tri-lingual Platforms does not really deal with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es in the late Jiajing period.

Key words: Xu Jie; Tri-lingual Platforms; Imperial power; Free speech

(编辑: 杨峰)